國家發展研究　第七卷第一期
2007 年 12 月　頁 95-120

鄉關何處？
論日本邪馬台國研究中的自我認識

周德望*

收稿日期：2007 年 5 月 3 日　　接受日期：2007 年 12 月 15 日

*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現就讀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電子郵件：adolph.chou@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摘要

邪馬台國是否為日本歷史上大和政權的前身？或是有何關係？自古就是日本自我定位的一個重要根源。尤其戰後對於皇國史觀的反動下，本來那個堅信不已的神話起源基礎已經受到質疑。如果現在要重述日本的歷史，那日本這個國家是誰建立的？這個問題就更顯得重要。本文透過日本歷史上關於邪馬台國研究的分析，試圖來瞭解日本人是如何去面對這個問題的？日本唯有透過中國的史料《魏書倭人傳》回過頭來尋找自己的國家起源。探討的範圍由日本大化革新之後的主流觀點，以及江戶時代的國學派，二十世紀初期白鳥庫吉與內藤湖南開啟的邪馬台國爭論，一直到戰後的重要說法等。邪馬台國地理位置與卑彌呼身份的定義，這之間的差別都反映出必須處理與中國關係的心理需要。

關鍵詞：倭人傳、邪馬台國、卑彌呼、白鳥庫吉、內藤湖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前言

> 在闡述日本国家的起源時，考古學不是萬能的。因為考古學方面的遺跡和遺物只是流傳下來原始、古代人生活的痕跡。不管發掘工作怎樣進展，只要未發現刻有文字的遺物，那就不可能掌握政治過程和社會組織。
>
> 井上光貞《日本国家の起源》岩波書店，1960 年[1]

日本一直到明治維新之前，被區分為六十六個古分國，位於琵琶湖附近京都一帶的稱為「畿內或是京畿地區」，這裡往南方的山脈中有個古國叫做大和（Yamato），位置及範圍大致相當於現今日本的奈良縣。目前的考古及歷史資料表示，至少從西元初之後，日本的主要政權首都一直在大和一帶，所以日本人也往往自稱為大和民族。

邪馬台國是否為日本自古以來大和政權的前身？或兩者間有何關係？長期以來都是日本自我定位的一個基本前提。尤其在戰後，皇國史觀的反動下，本來那個堅信不已的神話起源基礎已經受到質疑。如果要重述日本的歷史，那日本這個國家是誰建立的？這個問題就更顯得重要。日本的歷史教科書，戰前一直以記紀神話為主的日本起源說，到了戰後主要的內容多改使用中國《魏志倭人傳》的資料[2]。

在六〇年代之後，這樣的研究開始隨著社會心理的需要，走向不嚴謹的研究方法，一時之間邪馬台國成為報章雜誌、廣播電視的熱門話題，研究這個問題的人與各種著作都紛紛出現。到 1987 年為止，在日本至少就有 346 本關於邪馬台國的著作，這還不包括雜誌、報紙的發表。[3]各種不同的定義與說法也開始豐富了這個研究領域，其中更有不少想像成分

1 井上光貞，《日本国家の起源》，東京都：岩波書店，1960，序文頁 2。
2 佐伯有清，《研究史－戰後の邪馬台国》，東京都：吉川弘文館 1972，頁 5。
3 彭雙松，《徐福與邪馬台國》，台北：自行出版，1990，頁 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很高，可能是針對讀者需要所做的作品。也許反過來思考，這樣的現象其實不只是學術嚴謹的問題，而是一種社會心理上的需要，同樣的，被視為較為正式的歷史研究中，是否也是反應出了某些日本人心中對於自我認同的觀點？

回顧整個日本歷史討論或陳述邪馬台國問題時，一直關注著兩個核心。首先就是位置在哪裡？事實上這不只是地名的問題，而是政治上關於日本國家的想像。更進一步的是，這位中國歷史上記載的卑彌呼到底是誰？他不論是倭女王或只是一個小部落的女巫，都涉及第三世紀的時候日本是否已經形成單一國家，更包括了這個國家的性質與對外關係。現在的日本已經走向「客觀」的考古發現來回答這些問題，不過，這些戰後陸續出土的文物卻並沒有解決這些問題，只是更加深了論戰的內涵。

貳、邪馬台國的史料記載

一、倭國與邪馬台國

邪馬台國的存在，後人只能從中國對其的記載中尋找這個東方島國的影子。所以，是否接受中國史料或者說如何解讀中國史料，就決定了日本對於最初國家的想像。關於邪馬台國的研究與論戰中，來自中國記載的史料一直是最基本的參考依據。

中國的史書最早從《論衡》、《山海經》就多次談及了倭人或是有個附屬於燕國下的倭國，不過這裡指的「倭」到底是不是現在的日本，一直都難有定論，因為並沒有更進一步關於地理或是文化的任何描述了。班固《漢書》的地理志是最早確定倭國就在東方的海上：「樂浪海中有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4]」至此也只是確定了東邊的海上有倭人，在政治體制上並沒有統一，隔段時間會來朝獻物。到了范曄《後漢書》中的《東夷列傳》中提到了倭國：「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5]」，之後又有數次關於倭國國王來獻的紀錄。至此對於倭國的記載依然是很模糊，這個倭國到底是不是日本的國王？其國家的性質以及詳細情形為何？仍無法確定。[6]因此可以說在邪馬台國的記載出現之前，日本很難被認定是一個統一的、有規模的國家。

邪馬台國存在的證據，也如同「倭國」一樣，必須依靠中國的歷史文獻記載。最重要的就是西晉陳壽（233~297）所做的《三國志》（280~289）中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的一部份，就是現在所謂的魏志倭人傳。資料的參考來源，就是當時曹魏的政府官方資料等，倭人傳全文將近兩千字，分為道里戶數、風土習俗、行政制度、兩國通交等四個部分，基本上可以說十分詳細的記載了西元第三世紀，位於中國東方的某個島國上的情形。相較於前述的倭國，對於邪馬台國的描述突然增加了許多篇幅及具體內容。而日本方面，因為在《日本書記》神功皇后記載中，多次直接引用了《魏志・倭人傳》的記載，因此神功皇后也往往被認為就是統一日本的卑彌呼。這個敘述是否可認定為日本的大和政權？也就是說日本這個國家的具體雛形？

---

4 班固，《漢書》，（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二十五史資料庫，新校本後漢書，瀚典全文檢索系統 1.3 版，1997 年），卷 28〈地理志〉。

5 范曄，《後漢書》（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二十五史資料庫，新校本後漢書，瀚典全文檢索系統 1.3 版，1997 年），卷 85〈東夷列傳〉。

6 於日本福岡曾發現一「漢倭奴國金印」，現存於九州福岡市美術館。應為西元 57 年，東漢光武帝所賜與，被視為最早中日交流的象徵。事實上中日間的國際關係是早於邪馬台國時代，但是在被稱為「倭國」的年代，倭國到底可否代表日本？也許只是日本民族中的一個小國？而邪馬台國所代表的國家意涵遠大於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卑彌呼的身份

《倭人傳》談及最初統一倭國的是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並詳細地描述了這個倭女王。「其國本亦以男子為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年已長大，無夫，有男弟佐治國・自為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7]」這個共立一女子為王，就是日本國家最早的統一概念，歷史上的日本就隨著邪馬台國而出現。這個來自中國記載的日本國家起源還詳細的描述了這個名為卑彌呼的女王。事鬼道、能惑很明顯的代表了一種政教合一的體制，又保持神秘，不與人見面。這個短暫的說明，卻是日本國家起源的重要關鍵。因為政治體制的統一，才能符合民族國家形成的基礎。因此日本人開始在神話中或是歷史中尋找能夠與其相符合的女性人物，包括了神功皇后、倭姬命、熊襲女酋、部落的女巫等等。

最後關於卑彌呼的記載是「詔書、黃幢，拜假難升米為檄告喻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徑百餘步，葬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為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與，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匹。[8]」記載到卑彌呼死去，邪馬台國內亂，雖然有壹與為的女王，但是關於邪馬台國的記載也到此為止，可以說對邪馬台國的記載並沒有超過卑彌呼的統治時期。

7　陳壽，《魏書》（台北市：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二十五史資料庫，新校本三國志，瀚典全文檢索系統 1.3 版，1997 年），卷 30〈倭人傳〉。

8　陳壽，《魏書》，（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二十五史資料庫，新校本三國志，瀚典全文檢索系統 1.3 版，1997 年），卷 30〈倭人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地理位置的研究

目前的研究分為兩種解讀（見圖一），一是認為記載方位有錯的「連續說」，二是主張記載距離要重新理解的「放射說」。「連續說」認為倭人傳的方位記載有誤，因為當時中國傳統地理觀念認為九州在北、本島在南，而陳壽應該是接受了這樣的看法。故解讀時須把方位轉九十度，如此邪馬台國的位置就在日本古國大和（現在奈良縣）一帶，成為「大和說」或「畿內說」的基礎認識，內藤湖南之後的大和說主要建立於此[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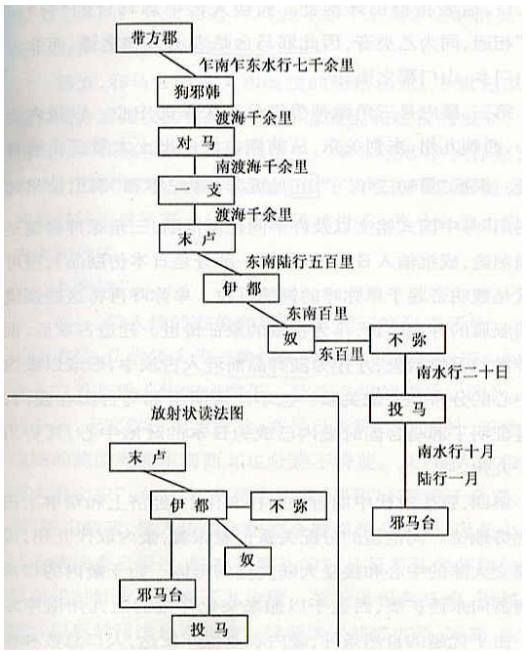
「放射說」則認為中國的天文、航海技術其實已很成熟，所以方位、里程、日程的記事都沒有矛盾。問題在於航海日程換算成距離的算法，不能以現在的標準來換算當時的航海能力。必須以「伊都國」為起點，用放射觀點來判讀邪馬台國的相對位置[10]。依照這個算法，邪馬台國大致上不出九州一帶，九州說從白鳥庫吉起已有提及，到榎一雄[11]完整提出放射狀的地圖觀點，使九州說長久以來無法解釋航海日程的弱點，重新在倭人傳中找到論證基礎。可參見兩者間對於邪馬台國位置與日本地理具體地點的差異（見圖二）。

對於日本人來說，邪馬台國代表了一種最初的國家形式，至少包含了兩種意義，一為國家起源、二為民族起源。當以現今民族國家的概念去理解時，其所在的位置，就回答了日本在當時是不是已經是統一的國家了。如果接受了邪馬台在大和說法，那就代表了日本在西元二世紀已經是個以大和為中心的統一國家，那就代表日本的文明可以上述至更為久遠的年代。如果接受了九州說，那代表了至少有九州與大和兩個文明中心的存在。

---

9 沈仁安，《日本起源考》（北京：崑崙出版社，2004），頁 81。
10 沈仁安，《日本起源考》（北京：崑崙出版社，2004），頁 85。
11 榎一雄（1913~1989），東京大學教授，致力於日本東洋史文庫的收藏，是日本戰後重要的東洋史學者。其在昭和 22 年的專文《魏志倭人伝の里程記事について》中提出完整的放射說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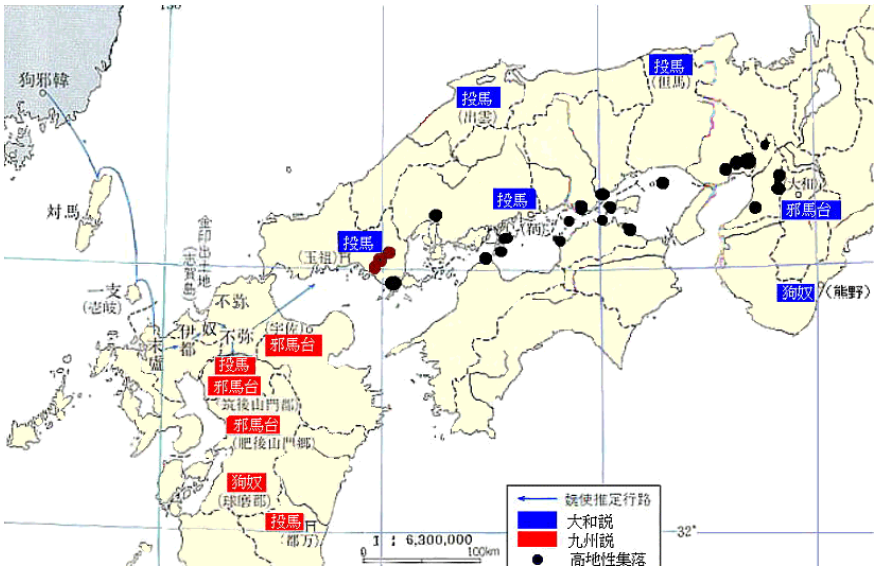
圖一

（邪馬台國位置路線圖。右邊是連續說，左下是放射說。沈仁安，《日本起源考》（北京市：崑崙出版社，2004），頁 83。）

四、與中國的關係

以魏志倭人傳的記載中，邪馬台的倭女王第一次與中國交通是在景初二年（238 年），記載如下：「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為親魏倭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二

（九州說與大和說的推論地圖，引用自日本網頁邪馬台國大研究本篇５.文献は語る－中国国史・その２－http://inoues.net/yamahonpen3-5.html）

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為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蒨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12]」

這裡很清楚的記載，是倭女王卑彌呼主動來使納貢，且受到當時魏明帝的厚重回禮以及封其為「親魏倭王」。這應該是歷史記載中，最早的

[12] 陳壽，《三國志》（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二十五史資料庫，新校本三國志，瀚典全文檢索系統 1.3 版，1997 年），魏書卷 30〈烏丸鮮卑東夷傳倭人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日以國家形式的往來[13]，更直接的說法就是倭國加入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其後在正始元年、正始四年、正始六年等，仍有卑彌呼多次上貢與魏國友好交通的紀錄。之後在正始八年，卑彌呼請魏國派人來調停其與附近各國的糾紛。卑彌呼死後，繼承者壹與也繼續上貢得到中國承認的正當性。可以推想在這樣的記載中，當時的邪馬台國是十分依賴中國這個體系而存在。如果日本人接受了這樣的邪馬台國，是否代表了日本是屬於中華文化圈的一個部分？

參、日本傳統的邪馬台國定位

一、傳統的大和「神功女王說」

在國學派的復古主義出現之前，日本對於邪馬台國的說法幾乎是定調的。因為在《日本書記》中的神功皇后紀三十九、四十、四十三年各條引用魏書倭人傳的記載。官方將倭人傳中的卑彌呼等同於神功皇后[14]，認定邪馬台國是位在日本畿內一帶的大和政權[15]。如鎌倉時代《釋日本紀》一書中記載：「邪馬台係取倭之音」。甚至到了江戶時代的《異稱日本傳》中亦稱：「今按，邪馬台國，大和國也。」一時無人提出關於邪馬台國位置的質疑及深入研究[16]。神功皇后（170~269）此人是日本在西元二三世紀的統治者，並且多次征討朝鮮，也就是記載中的卑彌乎；這個說法一直就是日本在戰前的官方基本論調。

---

[13] 此所謂最早的中日國家關係，係指認為在邪馬台國建立之後才有整體的日本國家觀念。

[14] 神功皇后（じんぐうこうごう），傳說中第十四代哀仲天皇之皇后，曾遠征朝鮮半島的新羅。在二戰之前被視為勇猛、軍神而崇拜；戰後被視為具有安產、守護性質的柔性女神，供奉的神社非常的多，最具代表性的是福岡市香椎宮。參考自戶部民夫，《日本の神様がわかる本》（東京：PHP 研究所，2005），頁 21。

[15] 白鳥庫吉，〈倭女王卑彌呼考〉《白鳥庫吉全集》，卷一，東京都：岩波書店，1969，頁 7。

[16] 沈仁安，前引書，頁 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傳統的大和「神功女王說」說出現了一個轉變，那就是新井白石（1657~1725）在 1716 年完成的《古史通與問》，該書沿用日本書記的觀點，將神功皇后與卑彌呼視為一人，邪馬台國的位置也就是日本古代的大和國。但是新井晚年，開始改變了自己本來的論點，在 1724 年，他指出了「魏志是實錄」的看法，開始挑戰日本書記的記載，改以魏志為本。在《外國之事調書》中他就開始採取了九州說的看法。[17]於是不同於傳統大和說的看法就由他開始討論，接著，國土封閉觀念的國學派出現更加深了這樣的地理位置與國族意識。

二、國學派開啟的九州「熊襲偽潛說」

關於邪馬台國的位置，最重要的大轉折就是國學派的出現。本居宣長在日本古典的註釋與闡釋方面，有著很大的突破與貢獻。基於恢復日本國學的立場，他對於盡信中國史料，如魏書倭人傳等，採取了一種批判的態度，結果因此出現了一種自我矛盾的看法。本居一方面完整引用了倭人傳的記載，承認記載中的神功皇后就是卑彌乎，另一方面卻又無法接受日本的領導統治者向中國納貢稱臣這個事實。於是本居提出了一種「熊襲偽潛說」[18]，認為中國資料中的邪馬台位在九州，但只是位在九州的熊襲國偽裝成大和政權名號去朝貢，中國所記載的卑彌呼只不過是熊襲國的女王。因此，的確有一個真的邪馬台國以及真的卑彌呼存在於日本的大和地區，但是倭人傳中記載的是一個「假」的卑彌呼及邪馬台國。以這個為基礎就是國粹主義九州說的基本論調。換句話說，就是認定中國的王朝被日本九州的熊襲國所騙，以為是大和政權去向中國朝貢，這種說法一直到二戰戰敗前伴隨著官方的皇國史觀而存在。

[17] 沈仁安，前引書，頁 71。
[18] 本居宣長，〈馭戎慨言〉《本居宣長全集》，卷八，東京都：筑摩書房，1972，頁 31-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白鳥庫吉曾經在《倭女王卑彌呼考》一書中提到「自本居氏之說提出以後，本朝學者幾乎一致將卑彌呼看做是熊襲之類」[19]。甚至更有人以此提出很多這種直接區隔了日本真正大和政權與邪馬台國關係的「九州說」或者稱為「九州女酋說」，各種熊襲國的卑彌呼是為了刺探中國情報之類的說法都相繼出現。[20]

一直到明治時代，雖然逐漸發展出更進步的歷史研究方法，但皆無捨棄本居宣長所留下的日本中心想法。那珂通世[21]運用記年的比對與考證方法，證明了卑彌呼與神功皇后在歷史上相差了約一百年，因此他們絕對是無關的兩個人。這樣的歷史考證其動機就是要辯稱，所謂向魏國朝貢，被冊封為「親魏倭王」，「王朝是絕對不會有這樣的事情，這是無須多言的。[22]」一直到明治時代的著名學者們，如管政友、久米邦武[23]等人，都是採用九州女酋說，其中的差距大概就是這位女酋位在九州的何處罷了[24]。最後在久米邦武在 1907 年出版的《日本古代史》一書中提到：「考證邪馬台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進入了探求其地的時期。」這代表了，這個從國學派開始，關於邪馬台國「熊襲女王說」的真偽討論已經結束了，之後要交由考古來證據的證據來支持到底真實的地點在何處？

那個時代下，大和政權的神功女王依然被視為在大和國，但日本的思想家開始區隔中國這個他者的存在與對日本的相互影響。在無法否定

---

19 白鳥庫吉，〈倭女王卑彌呼考〉《白鳥庫吉全集》，卷一，東京都：岩波書店，1969，頁 9。

20 詳見〈熊襲偽僭說の發展〉一文，佐伯有清，《研究史－邪馬台国》，東京都：吉川弘文館，1971，頁 40-48。

21 那珂通世（1851~1908），主張要使用實證的方法來研究東亞史，包括日本、朝鮮、中國等國。與內藤湖南來往密切，並且曾對白鳥庫吉的求學過程發生影響。對日本的古代記年有做出詳細的研究，是日本近代史學發展的重要人物。

22 沈仁安，前引書，頁 72。

23 久米邦武（1839~1931），是明治、大正時代重要的歷史學者，跟隨日本岩倉使節團赴美考察。後兼任帝國大學編纂委員，針對日本神道與天皇的關係做出重要的研究。有人認為邪馬台國的論戰可以由他開始起算，詳見佐伯有清，《邪馬台國論爭》，東京都，岩波書店，2006，第一章。

24 內藤湖南，〈卑彌呼考〉《內藤湖南全集》，卷七，東京都：筑摩書房，1970，頁 2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國史料真偽的狀況下，他們將卑彌呼與神功皇后做出本質上的切割，使得中日兩方的史料都能各自解釋。其實這很符合日本國學派主張「和魂漢才」的知識吸收方法——透過瞭解中國、承認中國的存在，然後反思日本文化中是否有中國的影子，然後將其切割。透過九州與大和的切割，日本得以在對中國納貢稱臣的情況下，找到日本大和政權的獨立性，甚至更進一步嘲諷的說卑彌呼不過是日本九州的異族，而中國只是跟如此蕞爾小國有外交關係。

肆、近代的邪馬台國論戰

一、邪馬台問題與中國學

由大和政權說發展到國學派為出發的「熊襲偽潛說」，這些說法都在各自的時代成為主流，並沒有說真正發生了論戰。真正關於邪馬台國的爭議其實開始於明治末年。隨著明治維新之後的西方史學衝擊，越來越多新的觀點透過所謂更為科學的解釋慢慢浮上台面。於是，人類學、神話學、民族學、考古學的研究都隨著日本維新之後的發展而引起新的討論。而最重要的辯論，是所謂支那學或是中國學者，因此，邪馬台國的問題又更明顯的是與中國、東亞概念做出對話，並以此來論證「日本的國家起源」。

白鳥庫吉以及內藤湖南都是日本的中國研究專家，兩者間最大的論戰卻是在日本邪馬台國問題。這反映了一種由中國或東亞概念下的日本自我意識，該討論一直延續至今。2000 年千田著《邪馬台国と近代日本》[25]以及隨後小路田泰直著《邪馬台国と日本人》[26]都針對內藤與白鳥的說法，提出了一些關於日本主義的討論，重點在於誰繼承了本居宣長

[25] 千田捻，《邪馬台国と近代日本》，東京都：日本放送出版協會，2000。
[26] 小路田泰直，《邪馬台国と日本人》，東京都：平凡社，20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國粹思想，透過一種是否能去日本的「本國中心論」來看日本，結論是內藤的主張可以去日本的「本國中心論」；而白鳥雖然走出漢學研究，但其實完全繼承了本居宣長的純粹日本主義觀點[27]。其推論的過程就是以地理上的位置出發，可見，九州說與大和說確實具有自我認識上的意義。

二、內藤湖南的大和說

京都大學的漢學家內藤湖南起於 1910 年開始在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文學會的雜誌《藝文》的第一年第二、第三、第四各號連續發表關於邪馬台國的研究，首篇《卑彌呼考》透過新的考據方式，也就是主張所謂的方位距離「連續說」。他指出「自投馬國水行二十日，陸行一月的距離，與從奴國一帶到投馬國的距離計二十日比較，並非不合理。並且當時有七百餘戶的大國，與其從邊陲的筑紫求之，不如從畿內的大和求之似乎更為穩當[28]。」這個基本論點接受了倭人傳中的記載，並以此來判定只有大和國在路程的時間以及腹地規模是符合這個標準的。他主要的成就在於確定邪馬台國在大和，提出了包括地名等的論證。

但是內藤認為倭人傳對於倭女王的描述其實可以是其他人；他假定卑彌呼的身份不是神功皇后，而是建立伊勢神宮[29]，並且支持日本武尊統一日本的倭姬命[30]。這倭姬命是日本神話中的人物，按照《日本書紀》的記載，他是第十一代天皇垂仁天皇的女兒，建立了伊勢神宮，並且在日本武尊統一日本的時候，給了他日本開國三神器之一的「天叢雲劍」。內藤由此挑戰了最為主流的國學派九州「熊襲偽潛說」，也因此被人質疑

[27] 佐伯有清，《邪馬台国論爭》（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 197。
[28] 內藤湖南，〈卑彌呼考〉《內藤湖南全集》，卷七，東京都：筑摩書房，1970，頁 262。
[29] 日本的神道系統有很多系統，天皇的國家神道基本上是建立在對伊勢神道的信仰上。因此，伊勢神宮在日本具有特殊的地位。
[30] 內藤湖南，〈卑彌呼考〉《內藤湖南全集》，卷七，東京都：筑摩書房，1970，頁 2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他這個作法是對皇室不敬。豬熊淺麻呂（1870~1945）就特別針對日本「伊勢神道」的重要代表倭姬命竟然被內藤說成是倭人傳裡面那個「事鬼道」的卑彌呼，而提出抗議[31]。

不論是神功皇后或是倭姬命，都是以日本書紀的神話為基礎來解釋。從內藤湖南主張「文化中心移動說」的思想脈絡來看，這樣的推論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並不需要將日本自外於中國。而認為文化中心的移動，往往會超越民族與國家的界限，中國文化中心移動的地域並不僅僅在大和民族居住的地區。他在一次於巴黎的演講中提到中國文化對日本的深遠影響，從文化上講，日本可以跟山東、江蘇一樣也稱為日本省[32]。並在《日本文化史研究》一書中，明白的提到：「日本文化是東洋文化、中國文化的延長，是和中國古代文化一脈相承的」[33]，簡單來說，東亞文明的內涵就是中國文化；而日本的認同並不會因為具有中國文化內涵而受影響[34]。

對內藤而言，也就沒有本居宣長那種不願接受日本曾經朝貢中國的為難。甚至在卑彌呼的角色上，不重神功皇后的對外發展，而改重視倭姬命在日本宗教、國家文化與政治形成的角色；前者是單純的政治角色，而後者更包括了文化意涵。換句話說，日本與中國是屬於同一個文化源流下的產物，換句話說就是在東洋脈絡下找到日本的定位；相對於東洋歷史發展的另一頭就是西洋文明。相對於有西方批判色彩的白鳥庫吉，內藤凸顯了一種中國文化為基礎的東洋觀。在目前的考古發現中，以京都大學為主的研究都普遍支持著內藤這樣大和說的論點。

---

31 佐伯有清，《邪馬台國論爭》，東京都：岩波書店，2006，頁 2。
32 嚴紹盪，《日本中國學史》，江西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頁 399。嚴對內藤湖南著《新支那論》一書的整理。
33 內藤湖南，儲元熹等譯，《日本文化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 12。
34 Stefan Tanaka 曾指出日本的認同早於中國文化之前就已確立，因此在中國文化的影響下日本人不會失去自我認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白鳥庫吉的九州說

在內藤發表邪馬台國研究的同年，東京大學東洋史學教授白鳥庫吉也在雜誌《東亞之光》發表《倭女王卑彌呼考》，站在近代史學的立場上，重新論證了九州說。白鳥的立場是根據地理方位上的考證，認為倭女王的邪馬台國就在日本古代的肥後國內，領土主要是在北九州一帶。並且從魏志的記載中，找到了卑彌呼一個巫女的形象「與其視作親自裁斷軍國政務的世俗的英明勇武的君主，不如看為閉居於深宮，從事祭祀，奉神意而收攬民心的宗教君主[35]。」。

這裡提出的說法，基本上是要支持白鳥自己對於日本人種起源的看法。白鳥的歷史哲學最主要的觀點是以南北雙元論為基礎，其對於日本人的來源，認為是亞洲南北兩種民族的融合，這就是日本的特殊性[36]。因此在他的觀點中，日本是亞洲的一部份，但是是唯一融合了南北兩大民族的國家。在地理上的推論，他認為日本的九州就是大陸的蒙古人種與太平洋的南方人種交接之地，而邪馬台國的位置就反應了日本民族形成的政治過程。

因此，卑彌呼可以是個女巫，因為這無妨於日本本身形成的特殊性，且反映出了一種白鳥的世界觀，那就是日本的形成必須放在亞洲史的角度來看，至於這個女巫或是邪馬台國是否承服於中國？他並沒有深入去談，而是跨過中國來看邪馬台國問題。換句話說，日本是亞洲的一部份，而中國並不等同與亞洲，依照佐伯有清的整理，這種主張依然是繼承了本居宣長的純粹「日本主義」，因為日本血統的起源雖然混雜；但是因為混血之後更為優越，所以在文化上依然是獨特的[37]。

---

[35] 白鳥庫吉，〈倭女王卑彌呼考〉《白鳥庫吉全集》，卷一，東京都：岩波書店，1969，頁 32-33。
[36]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19
[37] 佐伯有清，《邪馬台国論爭》（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 1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日本的起源既是放在亞洲發展的過程中來看，中國就不是重要的對象；也就是說日本是亞洲的一部份，而中國並不等同與亞洲。如此框架下，凸顯了一種地理學上的意涵，就是找出中國與日本的相對位置，或許有同樣的文化起源但是有著完全不同的文化發展。

內藤與白鳥各自在「西洋」文化出現之後，重新思考「東洋」文化中日本與中國的相對關係。可以說是一種在西方刺激下的兩種研究方式，內藤偏向了中國文化，正面地將邪馬台國放再以中國文化為核心的東洋歷史發展中；而白鳥偏向了西方的地理學與批判考據方法，或忽視或超越了中國文化對日本的意義。

伍、邪馬台論戰後的其他重要說法

一、津田左右吉的九州東遷說

白鳥的「九州說」中隱含了一個問題：如果當時邪馬台國在九州，那現在大和的政權是哪裡來的？九州政權與大和政權有什麼關係？白鳥的學生津田左右吉提出了九州東遷的說法。他接受了白鳥的九州說，在《邪馬台国の位置について》[38]一文中，主張卑彌呼不可能是日本的任何一位天皇，可能只是九州的一個女酋長。有人因此認為津田對卑彌呼的身份與邪馬台國的位置不但繼承了老師白鳥庫吉，甚至與本居宣長等國學派說法是一致的。簡單來說，在身份意識上被認為與所謂的皇國史學或是日本主義是相同的。

津田主張九州東遷的看法，但反對「東征」的概念，主張日本內部的和平地文明東移。其立場是來自於針對神武東征的研究，日本神話學家直木孝次郎認為津田左右吉為日本的神武傳說批判建立了一種研究

[38] 津田左右吉，〈邪馬台国の位置について〉《津田左右吉全集》第二卷（東京：岩波書店，1963），頁 5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法，這種方法不斷的被後人所承襲，已成為當前研究神話的一種主要方法，但這個辦法是否科學也值得懷疑的。這個研究方法可以被稱為是「分解投影法」，即把神武東征傳說分解為幾個部分，如從日向出發，東征和大和平定等等，分別尋求是否有類似的史實或是例子，說這是一種歷史概念的「投影」[39]。津田主要的論證基礎在於，由九州日向國出發的東征在地理上是不太可能的[40]，因此神武東征神話並不是日本真實存在的歷史記憶。並透過中國古代宗教的研究，認為征伐等殘暴、野蠻是中國的思想，並不是屬於日本的。既然神話思想不是日本本身的，那就不可能會有歷史事實存在。

更進一步，津田研究日本古代政治與思想時宣稱：「日本沒有征服戰爭；天皇因為有宗教權威，所以無需憑靠武力君臨地方豪族；皇室又是新文化的導入者，因而人們更加需要皇室，以求得新文化。其實，這是非常接近日本傳統的自我歷史觀念，那就是天皇權力的確立是由宗教權威和掌握先進文化，而使人們自然歸服的結果[41]。」所以，日本可以透過宗教文化來統合，根本上不需要內部的戰爭。因此，從神話中得來的「東征」概念也是錯的，九州東遷應該只是一種「和平轉移」的過程。因此，地理交通上的位置將十分的重要[42]。相對於日本大和地區，而九州在是比較接近中國的，天皇是更能夠擔任這個「新文化導入者」的身份。因為隨著這樣的文化力量，使得九州的政權發展東移到大和地區。

因此回過來與國學派的「熊襲女王說」相比，本居等人是因為不願意承認日本承服或是落後於中國，所以認為除了大和政權的卑彌呼以

[39] 沈仁安，前引書，頁 229。原文出自直木孝次郎：《歷史與神話》，吉川弘文館，1971 年。
[40] 津田左右吉，〈神武天皇東遷の物語〉《津田左右吉全集》，卷一，東京都：岩波書店，1963，頁 270-272。
[41] 津田左右吉，〈日本の國家行程の過程と皇室の恆久性に關する思想の由來〉《津田左右吉全集》，卷三，頁 450-457。此引用自沈仁安之整理翻譯，《日本起源考》，頁 180。
[42] 津田左右吉，〈シナ文化とインド文化〉《津田左右吉全集》，卷二十，東京都：岩波書店，1963，頁 2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外，九州有個偽邪馬台國。而津田正面接受了中國文化引入的概念[43]，九州女酋的部落國家，可以是落後於中國的，然後吸收中國的文化向東發展出日本的獨特文化；簡單來說，吸收中國文化無妨於日本本身的歷史發展獨特性。不過相對於前輩白鳥與內藤的爭論，以及後輩井上、江上等人的說法，津田對於邪馬台國的說法，並沒有受到重視；也許是其記紀神話批判的爭論太過重要，因此人們忽略了他對於邪馬台國的相關說法。

二、井上光貞的九州東征說

戰後最為流行的說法，是東京大學教授井上光貞主張的邪馬台國東遷說。井上身為日本戰後重要的東洋史學者，並曾參與多次歷史叢書的寫作，對於日本古代史研究十分具有影響力。其在《日本の歷史》[44]一書中，認為卑彌呼其實是神話中的天照大神，而倭人傳的記載中，有位弟弟輔佐他，則是神話中的須佐之男。極可能神武東征神話真的是從九州東遷的某些歷史記憶組合而成。事實上，邪馬台國在西元 266 年之後就突然消失在歷史舞台上，不再有任何的相關記載，所以有可能是東遷建立了大和政權。

井上在《日本国家の起源》[45]中提到，他在方法上繼承了津田的神話學與歷史方法，就是把神話與歷史事實劃上一定的等號，雖然與津田的結論不同，但是都是主張透過神話與歷史的比較出發來看之間的必然關係。

但是這樣在結論上與津田的差異，卻導致了截然不同的日本認識概念，那將會使日本神話起源的神聖性面臨到困境。天照大神其實不是神，

[43] 津田左右吉，〈日本の國家行程の過程と皇室の恆久性に關する思想の由來〉《津田左右吉全集》，卷三，東京都：岩波書店，1963，頁 443。
[44] 井上光貞，《日本の歷史 1 卷神話から歷史へ》（東京：中央公論社，1965 年），頁 42-45。
[45] 井上光貞，《日本国家の起源》，東京都：岩波書店，1960，頁 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是一個九州的女王。就算其統一了日本許多小國，但是日本的神話中最重要的主神，竟然是「親魏倭王」？而東遷就是指神武東征確有其事，日本的歷史也是充滿血腥、征伐的。相對於津田的觀點，那不就證明了日本記紀的記載是真實的？既然真實，最重要的神又是臣服在中國文化之下，那日本又回到中國文化的範疇內了。這種卑彌呼等同天照大神的說法，其實有不少人都主張過包括了和辻哲朗、原田常治等，一直到現在都還有安本美典推廣這樣的看法。這樣的趨勢，被佐伯有清認為是戰後日本邪馬台研究的反動，就是回歸到日本起源神話中尋找卑彌呼及邪馬台國的影子[46]。

或許有兩種解釋方式，可以說明這麼極端的自我認識。首先，就是日本完全是在中國文化的範疇之中討論，就跟之前的內藤湖南一樣。其次，也許中國已經被視為一個地理位置，因此中國與日本的相對位置已經不包含了文化認同的問題，換句話說，是忽略了中國的存在。如果按照白鳥、一直到江上波夫等東洋史研究的觀點，很有可能是後者。

三、江上波夫的騎馬民族說

從事東洋史研究的東京大學教授江上波夫，曾經主編《東洋学の系譜》[47]一書，整理自那珂通世、白鳥庫吉之後數十位東洋史學者研究及評論，因此對於人種起源以及研究方法也深受這些人的影響，可以說是具有東洋問題意識的研究學者。

江上在 1948 年提出的騎馬民族東征說，應該算是引起最多爭論，也最為極端的說法。其研究方法與白鳥的人類學文化研究十分相似，但是結論不太相同。江上的基本觀點是，認為有一隻稱做「通古斯族」[48]的

[46] 佐伯有清，《研究史－戰後の邪馬台国》，東京都：吉川弘文館 1972，頁 67。
[47] 江上波夫，《東洋学の系譜》，東京都：大修館書店，1992。
[48] 通古斯（Tungus）之名據說起源於土耳其語的 Tongus，意思是養豬人。主要分佈在三個地區，分別是外貝加爾湖一帶，外貝加爾湖到大小興安領地區，以及嫩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騎馬民族從朝鮮半島南部渡海，以超過日本各小國的軍事實力征服了九州，建立第一個征服王朝，就是所謂崇神天皇的崇神王朝，隨後的第二次征伐就平定了畿內大和一帶。所以說，神話中天孫肇國其實指的是被稱為「天孫族」征服倭國的故事[49]。

他的立論基礎來自於人種學的推論以及考古出土的文物比對。雖然這種亞洲人種遷移的說法早在白鳥之後就普遍被使用，但是日本的學術界普遍是不太支持江上的說法。雖然有很多不同的反對理由，比方說出土文物的解釋問題等等，但是仔細瞭解騎馬民族東征的說法，也許可以發現一種不同的身份解釋。依照江上波夫的看法，日本就是亞洲北方騎馬民族的後裔，在血緣與文化上類似中國北方的突厥人。日本的起源以及國家形成是屬於亞洲民族移民中的一個環節，那日本人種在起源上根本是沒有特殊性的。這不同於白鳥把亞洲兩大民族融合視為是日本的特殊性的看法，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把日本放在亞洲或是世界中的一份子來看。或者可以說，日本是亞洲強悍的騎馬民族之後，與中國的農耕民族是不同的。因此，日本與亞洲的游牧民族有共通性，而不同於中國。可以理解為，這是一個與中國各據一方處於亞洲的日本想像：日本位於亞洲之內但是不同於中國。

陸、在中國與世界之間的日本

明治時代之後，隨著福澤諭吉脫亞入歐的主張，日本主義出現了一種很有趣的身份意識。那就是開始把日本人的起源與「惡鄰」劃清界限，於是木村鷹太郎的希臘人之後說，小谷部全一郎的猶太人之後說，田口

松花江一帶。詳見徐逸樵，《先史時代的日本》，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頁 82。

[49] 江上波夫，《騎馬民族国家》，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67，頁 1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卯吉的匈奴人之後說[50]。以現在的觀點看來實在是十分奇怪，不過這些都是真實在日本被傳遞過的說法。

在六零年代的邪馬台考古、追尋熱潮過後，逐漸出現一個趨勢，那就是本來透過白鳥或是江上等人類學觀點的邪馬台國研究，開始變成考古、階級、人類發展史的研究為主，邪馬台國似乎已經不是主要討論的話題。回顧日本在八〇年代最重要的大部頭日本史《日本歷史大系》以及《講座日本歷史》，一直到九〇年代的《岩波書店・日本通史》的主要章節，都只介紹考古資料，很少直接談論邪馬台國的情況。根據中國大陸學者沈仁安對此現象的看法，這樣的安排似乎可以解釋為對於中國史料來解決日本古代問題的可靠性產生懷疑；因此改由日本自身的考古成就來回答日本的起源及國家形成問題[51]。

前述關於邪馬台國的研究，我們可以整合出一些結論。透過對於卑彌呼以及邪馬台國位置的討論，更重要的是與中國的相互關係，以及是否透過民族起源的說法，讓邪馬台國定位在亞洲的範圍內，或者說根本是世界史的一環。由最初的神功皇后大和說、本居宣長的熊襲偽潛說、內藤與白鳥的論戰、津田以及其後輩井上、江上等人對於邪馬台國的研究。都可以透過位置與卑彌呼角色的不同，甚至是所立基的研究方法差異，找到一種對於身份來源的詮釋。不論是文獻學上的分析、歷史發展的推論、考古學上的發現、神話或社會研究、人類學上的發展遷移說法，在許多主觀與客觀現象之間，自我身份的認識就不斷的透過這些「科學」或是「客觀」研究的過程中反映出來。我從哪裡來？這個鄉愁將永遠是日本人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也是支持這些「客觀」、「考古」研究的主要動力。鄉關何處？中國？亞洲？西方？世界？或是一個屬於神國的天堂？日本的國家起源想像就是透過中國學的發展為自己在世界歷史上找到定位。

[50] 徐逸樵著，《先史時代的日本》，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頁 77。
[51] 沈仁安，前引書，頁 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文獻

中文專書

彭雙松（1990），《徐福與邪馬台國》。台北市：自行出版。
沈仁安（2004），《日本起源考》。北京市：崑崙出版社。
嚴紹盪（1991），《日本中國學史》。江西省：江西人民出版社。
徐逸樵（1991），《先史時代的日本》。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英文專書

Stefan Tanaka, 1993,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日文專書

井上光貞（1960），《日本国家の起源》。東京都：岩波書店。
井上光貞（1965），《日本の歴史 1 巻神話から歴史へ》。東京都：中央公論社。
井上光貞（1960），《日本国家の起源》。東京都：岩波書店。
內藤湖南（1970），〈卑彌呼考〉《內藤湖南全集》，卷七。東京都：筑摩書房。
內藤湖南（1997），儲元熹等譯，《日本文化史研究》。北京市：商務印書館。
戶部民夫（2005），《日本の神様がわかる本》。東京都：PHP 研究所。
本居宣長（1972），〈馭戎慨言〉《本居宣長全集》，卷八。東京都：筑摩書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白鳥庫吉（1969），〈倭女王卑彌呼考〉《白鳥庫吉全集》，卷一。東京都：岩波書店。
江上波夫（1992），《東洋学の系譜》。東京都：大修館書店。
江上波夫（1967），《騎馬民族国家》。東京都：中央公論社。
佐伯有清（1971），〈熊襲偽潛說の發展〉《研究史－邪馬台国》。東京都：吉川弘文館。
佐伯有清（1972），《研究史-戰後の邪馬台国》。東京都：吉川弘文館。
佐伯有清（2006），《邪馬台國論爭》。東京都，岩波書店。
津田左右吉（1963），〈邪馬台国の位置について〉《津田左右吉全集》，卷二。東京都：岩波書店。
津田左右吉（1963），〈神武天皇東遷の物語〉《津田左右吉全集》，卷一。東京都：岩波書店。
津田左右吉（1963），〈シナ文化とインド文化〉《津田左右吉全集》，卷二十。東京都：岩波書店。
津田左右吉（1963），〈日本の國家行程の過程と皇室の恆久性に關する思想の由來〉《津田左右吉全集》，卷三。東京都：岩波書店。

網路資料

班固，《漢書》，（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二十五史資料庫，新校本後漢書，瀚典全文檢索系統 1.3 版，1997 年），卷 28〈地理志〉。
范曄，《後漢書》（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二十五史資料庫，新校本後漢書，瀚典全文檢索系統 1.3 版，1997 年），卷 85〈東夷列傳〉。
陳壽，《魏書》（台北市：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二十五史資料庫，新校本三國志，瀚典全文檢索系統 1.3 版，1997 年），卷 30〈倭人傳〉。
日本網頁邪馬台國大研究本篇５.文献は語る－中国国史・その２－ http://inoues.net/yamahonpen3-5.htm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lacing the Origin of Japan : The Japanese Self-knowledge in the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Yamata

Te-Wang Chou

Abstract

If Yamata is the forerunner of Yamato government in Japan's history?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amata and Yamato? This question was a major source of Japanese Self-knowledge from past. The myth of Japan's origin believed firm before was queried in the reaction of Royal historical view after WWII in particular. Now, as we rewrite Japan' history, who established Japan is more important. This paper wants to find out how Japanese face the question by analyzing the Studies of Yamata. Japanese only depend the papers（Book of Wei） form China to trace back Japan's national origin. The discuss including the major view of Taika Reform, the Kokugaku's idea, the argument between Shiratori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Kurakichi and Naitō Torajirō, until several major view after WWII. The difference of Yamata' location and of Himiko' role might reflect some psychologically needs, which must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Keywords: Book of Wei, Yamata, Himiko, Shiratori Kurakichi, Naitō Torajir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